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草明專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草 明专集

辽宁大学中文系编

一九七九年四月

前 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刘知侠、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何为、周立波、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风、郭小川、郭沫若、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上海早晨》、《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

(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

下列内容：

(1) 作家传略

(2) 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3) 评介文章选辑

(4) 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 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 本专集由辽宁大学中文系刘跃发、乌丙安、徐国纶同志编选。

(七)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

一、草明小传	5
二、生活与创作体会	7
幸福的道路	7
——短篇小说选前言	13
草明同志谈创作体会	13
回顾与前瞻	19
从希特勒的自我描写说起	27
——创作随笔之一	
垫脚石	30
——创作随笔之一	
写《原动力》的经过	32
《乘风破浪》后记	37
工人给我的启示	38
衷心感谢毛主席	43
指路明灯	48
毕生为人民写作	53
做好这名尖兵	56
深入群众生活的点滴体会	59
永远在火热的斗争中	66
三、评论文章选辑	70
社会的原动力和创作的原动力	胥树人 70
读草明的《原动力》	李云龙 79

评《火车头》·····	蒙树宏	86
读《火车头》·····	熊白施	91
一部反映工业建设的好作品·····	黄沫	96
——读《乘风破浪》		
没有辜负工人的希望·····	陈森	107
——读《乘风破浪》		
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风格·····	方明	119
——评《乘风破浪》		
事业的主人和文学的主人·····	罗荪	130
——试论《原动力》《火车头》		
《乘风破浪》中的工人阶级形象		
四、草明作品及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152

一、草明小传

草明，女作家，一九一三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的以缫丝、养蚕、种桑为业的乡镇的一个破落家庭里。一九二七年随父亲赴广州念小学，一九二八年夏，跳级考上广东省立女子高中师范学校读书。在该校读书时期酷爱文学，从高尔基和鲁迅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受到了启发。面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她对不合理的社会发生了怀疑。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她基于爱国热忱，参加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并开始了写作。一九三三年被通辑，逃亡上海，同年加入左联，从此就在上海以职业作家的身份从事左翼文艺活动，曾一度在上海被捕入狱。她的第一篇小说《倾跌》是在左联的机关杂志上发表的。接着陆续写了《万胜》、《进城日记》、《大涌围的农妇》等，此外还有中篇小说《绝地》。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她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从上海到广州，又到重庆，写下了许多作品，有《阿衍泊姆》、《受辱者》、《新嫁娘》、《遗失的笑》等等。以上两个时期的创作，绝大多数是写工人、农民的痛苦生活与他们对旧制度的反抗精神的，侧面描写了他们罢工斗争和抗日活动。

草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于一九四〇年到了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一九四二年，她亲自聆听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从事文艺活动。抗战胜利后，她走了许多地方，和工农兵接触，了解他们的斗争，写了不少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都收在

《今天》一书里。一九四六年夏天草明到了东北，在邮电工会、镜泊湖水力发电厂、沈阳铁路工厂做群众工作，也到过另外一些机器制造厂体验生活。一九四八年夏写了中国的第一部工业题材的中篇小说《原动力》，一九五〇年写了长篇小说《火车头》。同时，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一九五〇年出版了短篇小说《新夫妇》。一九五四年落户到鞍山居住，任“鞍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一九五六年为少年儿童写了中篇小说《小加的经历》。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写的短篇小说和报道，多数收在《爱情》和《延安人》集子里。一九五九年写了反映钢铁工业大跃进的优秀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一九六四年十月，从鞍钢到了北京、从事专业创作。

文化大革命中草明深受林彪、“四人邦”的压制和迫害。粉碎“四人邦”以后，她重新拿起笔进行战斗。除在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一些纪念毛主席和《讲话》的散文外，现在正创作一部工人阶级对林彪、“四人邦”斗争的长篇小说。草明任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一届至第三届文代会中均被选为全国文联理事。

二、生活与创作体会

幸福的道路

——短篇小说选前言

亲爱的读者，你有这个经验吗？当一个人去一个生疏的地方时，往往走一段路，便回过头看看他走过的路，看走错了没有，方向对不对头。我就是爱这样做的一个人。因为自己脑笨眼拙，所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是多问，多回头看看，以免走冤枉路。不仅走路是这样，甚至做工作，我也爱在做了一段工作之后，把接触过的人物“过过电影”。使有些人物印象更深些；并且总结总结这一段工作取得了什么效果，出了多少差错。以便能及时改正错误，发挥长处。至于写作，我更需要经常回顾，经常总结经验了。

我编这个集子，选出自己廿五年来的创作中各个年代的一部分短篇小说来，就是为了检阅一下自己创作中走过的道路。当然，这二十几篇小说，并不是我作品的全部，更没有包括中长篇在内。但是，这也可以看出自己在创作道路上所走过的脚印的一般来。

不回顾也就罢了，一回顾，便发现我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是充满着斗争的。这里说的斗争，有两方面，一是以作品为武器，和阶级敌人、民族敌人作斗争；二是自我思想斗争——自从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我投身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改造思想，改变文风的自我斗争。这些斗争多么锻炼人啊。它加速了一个作家思

想上的成熟。

回溯我读中学的青年时期，是个风云万变，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动荡的年代。大卖国贼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转入地下，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军阀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连年内战。日本军国主义乘机侵略我国东三省。蒋介石不敢抵抗，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实行两种围剿，一是对苏区的武装围剿，一是在大城市搞的文化围剿。中国人民要求抗日，反法西斯专政，但他们生活却处在战乱、饥荒、失业和当亡国奴的水深火热之中。我国进步爱国青年，纷纷起来用各种方式，反抗这个腐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我也卷进了爱国进步学生的行列。我参加了由一些同志写作和编印的一个给劳苦大众看的、用地方话写的小刊物的工作。那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穷困悲惨生活和抗日要求的。我用地方话写的《万胜》等短篇小说，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后用普通话改写）。那是我根据童年时代我们镇子的缫丝女工的悲苦生活做素材，在课堂上和寝室里悄悄写的。因为作品里透露了工人们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于是，我的名字和许多同志、老师、同学的名字，被列进了反动派要通缉的黑名单里去了。我们有一部分人逃亡到上海去。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我加入了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拿起笔作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在一九三二年——一九四二年这十年里，我写的短篇和中篇，多半反映缫丝女工的痛苦和反抗（例如《倾跌》）、《水鬼》和《一个私塾教师》等篇，是写困苦的市民对旧制度的怀疑和迷惘。我也曾从侧面去写罢工斗争（如短篇《没有了牙齿的》和中篇小说《绝处逢生》）；直到写知识分子奔

向光明——投奔解放区（《陈念慈》）。这是我三十年代所写作品的主要内容。

这个时期的作品，是根据我少年生活的经历，并通过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写出来的。这些肤浅的作品对当时知识分子的青年读者来说，可能多少起过促进他们对现实的怀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的作用。但是，终究由于我不懂得投身到工农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进行思想感情的改造，（自然，那时的白色恐怖也不允许作家到工农群众生活中去）；不懂得自觉地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观察生活，分析生活；因而不能很好地、真实地反映工农群众的精神面貌。在艺术语言上，更是明显地受西欧文学的影响，句子欧化，学生腔。不过，由于有党的领导，有鲁迅等先辈的指引，那时我所走的步子还是正的；所写作品对旧制度起着破坏作用。因此我被国民党视为危险分子，是他们的鹰犬所追踪的目标之一。

在和黑暗战斗的日子里，自己能够站在革命的行列，而被敌人所憎恨；我虽在敌人的黑暗的牢房里，也能安之若素，并感到自豪。

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的山丹丹花盛开了，串串驼铃的有节奏的美妙的声音，因春风吹拂，响彻原野。毛主席的划时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响遍了中央大礼堂，响遍了上空。我亲自参加了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并倾听了他的讲话。

毛主席的讲话深深地震动了我。特别是提出文艺为工农服务，文艺工作者应和工农兵结合的方向。我过去一直不懂得这样做。毛主席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弊病！我才深刻认识到自己有长期到工农兵斗争生活中去改造思想的必要。

我到延安农村去过一段时间；后来，从延安到张家

口，我一路找机会接近工农兵，《延安人》《他没有死》《解放了的虎列拉》《今天》《新夫妇》等就是反映那些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这短短的几年，我的作品的内容比过去充实些了；文风也开始有生气了，能接近群众的口语了。我初步尝到了听毛主席的话，到工农兵中去的甜头，心里多么高兴呀！我决心一辈子按毛主席的教导走下去。

我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和工人们战斗在一起，是一九四六年以后在东北的十八年间。在这些年中，我曾和邮政工人一起斗过粮霸，帮助工人建立工会。我曾到镜泊湖水电站去，向工人们学习，并给他们上文化课，组织家属种菜、养鸡。我也参加过皇姑屯铁路工厂师傅们的使死车复活的活动，以便加速解放军南下去解放全中国。我还到过一些机器厂去体验生活。后面的十年，我落户鞍山，在一个炼钢厂的党委里做宣传工作。钢铁工人的模范事迹给我的教育是至为深刻的，我和他们战斗在一起，我分担工人们和保守思想作斗争的忧虑，也分享他们胜利地完成快乐的快乐。这种胜利的快乐，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呀。和东北的工人师傅一起战斗的十八年，我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我除了完成日常的工作外，我还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与散文；还做了八九年的辅导工人业余作者的工作。

在这个集子里，我一并选了我在鞍钢写的《诞生》《在祖国的土地上》《迎春曲》《姑奶奶》《姑娘的心事》《爱情》等篇。供读者鉴阅，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六四年，我到了北京，到机床厂去体验生活，但没有来得及写出长篇或中篇，只写了《接班》和《幸福》，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这伙暗藏的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

家，他们最憎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他们只知道折磨我们，并夺去我们手中的笔，不许我们写歌颂党和歌颂人民革命斗争的作品。

我是毛主席的文艺战士，我不能长期沉默，一九七三年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投到几个编辑部去，都给退回来了。我不服气，又以机床厂的新人新事做素材，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幸福》。投寄某编辑部，不久又退回来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象我这样上了“四人帮”“黑线人物”名单，不写反映民主派——走资派作品的人，是没有发表作品的园地的。隔了几个月，有些好心人把《幸福》送到《解放军文艺》去发表了。谁知，因此闯了祸，事后该编辑部竟受到“四人帮”的围攻。“四人帮”向他们大兴问罪之师：“为什么发表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的作品”，这篇《幸福》就遭到了这样不幸的际迁！

就这样，我只好不写了。一个文艺战士不能拿笔去战斗，精神多痛苦啊！但是，我不能罢休，只好改变了战斗方式，我默默地在工厂里继续辅导工人业余作者。寄希望于他们早日成长，让他们去写他们自己的战斗生活吧。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诬蔑从《国际歌》以来文艺界是一片空白。真是胡言一派！

三十年代由党所领导，鲁迅所率领的这支左翼文艺大军，浩浩荡荡，以文艺为武器，同反动派作斗争的历史事实，谁也抹煞不了！如果是一片空白，蒋介石何必慌了手脚，派遣那么多文化特务（包括张春桥在内）来监视这些进步作家艺术家；盖那么多监狱来镇压文化政治犯呢？柔石、杨杏佛等烈士作家，不是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的吗？原来

“四人帮”的文化专制和镇压手段是从他们的祖师爷那儿学

来的。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光辉《讲话》发表后，革命的文艺比三十年代更茁壮成长，出现了万花争艳的局面；中国文艺空前繁荣，绝不是“四人帮”这些丑类所抹煞得了的。他们搞阴谋文艺，忘图从文艺界打开缺口，宣传他们的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纲领，以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这一切都是痴心妄想！党不允许，人民不答应！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到头来变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遗臭万年。

我作为三十年代走过来的文艺战士，特别是在毛主席的工农兵方向指引下实践过来的文艺战士，对“四人帮”的诬蔑不能缄默，我要用自己的实践戳穿他们的谎言，要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拨正过来。于是，我认为选出我的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一些短篇来出一个集子是有必要的。是 掷 向“四人帮”的一颗手榴弹。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给了我们战斗的武器——笔！我们是含着感激的眼泪接过这只战斗的笔的！我决心拿它来狠狠地射向“四人帮”，我并将这支笔用来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

三十多年前，还很幼稚的我，绝没有想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有那么尖锐复杂的斗争，创作道路上还会迁到这么多险风恶浪！但是，在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中，马列主义逐渐地武装我的头脑，所以在这场与“四人帮”的复杂斗争中，我对他们对我的迫害，还能安之若素，以自己能和广大文艺战士经受“四人帮”的迫害，和广大群众经历了这场空前的严峻的考验，引以为荣！

按照马克思回答他女儿问他对幸福的理解的说法，斗争

就是幸福。那么，我的漫长的创作道路充满着斗争，也就应该说，我的创作道路，由于由党的指引，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斗争，确是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

在回顾与前瞻中，我心绪澎湃，不禁从心底里激动地高呼：感谢马克思！感谢毛主席！感谢教育我的工人阶级！

一九七八年六月北京

草明同志谈创作体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访问纪录稿）

在我二十五年的写作经历中，写作的内容主要是写工人，写工业方面的题材。

幼年时期家住广东省顺德县一个缫丝工业的小镇上，亲戚邻里多是从事这种生产劳动的女工。这是我接近工业生产的一个开端。年岁稍大后，进城读书。青少年的生活影响，使我看惯了马达、电线架、桥梁之类的景物；我生活的那个镇子，除了手工业，一部分机器工业之外，其余的还有一点经济作物，例如种甘蔗、植桑、养蚕、养鱼等等，根本没有种田的，这就使我不了解真正的农村，也不习惯农村生活。

十九岁时，在高中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跟着，受进步教师的影响，参加了秘密读书会。还参加了一个进步的，办给工人看的小报，开始了写作活动。由此，我的名字和一些进步文化人，进步师生的名字一道，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于是，我于一九三三年和一些同志逃亡上海，同年加入了“左联”。到上海后，就很少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从三三年到三七年“七·七”事变这几年里，就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写东西，描写缫丝女工的痛苦生活，写她们的反抗，也写一些劳动人民与统治

阶级的反抗和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先后在广州、沅陵、重庆从事抗日的文艺宣传活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周总理叫我去湘西的沅陵办报。从三二年到四一年这十年里，我所写的小说的内容基本上是两方面：一是反映缫丝工人的生活与反抗；二是反映贫苦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

一九三八年，在广州期间，正值郭老主持《救亡日报》，夏衍同志任主编。我在那儿参加副刊记者的工作。这时，接触到一些劳动人民，领会到下层人民的抗日要求。由于青年时代很受高尔基的影响，使我喜欢写贫苦的下层人民的生活。

一九三九年我到了重庆，从事抗日写作活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我们在重庆呆不下去了，周总理叫我和一些作家撤到延安。一九四二年参加了毛主席亲自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是我在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没听过作家要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是文艺方向。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对比之下，才感到自己相当脱离实际，脱离工农。过去写的东西，虽然写的是工人和劳动人民，但只停留在和劳动人民有所接触而写他们。却不是有意识地深入工农的生活斗争，改造思想、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决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接近和表现工农。这期间，曾到陕甘宁农村去体验生活，这对我是很有好处的，使我接近了西北的农民。

日本投降后，从延安到山西，张家口，又到齐齐哈尔，后来到了哈尔滨定居下来。这个时期一路走一路做工作，一路访问工农兵，也一路收集材料。写了些短篇小说。如《延

安人》、《解放了的虎列拉》、《新夫妇》，就是那时期写的。路过了张家口时，曾到宣化龙烟炼铁厂的工会做了五个多月的工会工作，帮助工人出墙报。这是我第一次和解放了的工人接触。工人对我非常热情，使我学会了和他们谈心。在这里写出了《龙烟的三月》、《沙漠之夜》等散文。一九四六年的哈尔滨，还没有建立文艺团体，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大批干部下乡搞土改，我也报名去农村，但因一时水土不服闹了病。林枫同志劝我暂不要下去。他说：“搞土改不是两三个月的事，以后有机会去。你不如到镜泊湖发电厂去看看，那儿搞得很好”。他认为城市领导农村，我国作家应该熟悉城市，熟悉工业、熟悉工人。于是，我就去这个发电厂了。我有了龙烟炼铁厂接触工人的经验，这次去发电厂就顺利多了。这里工人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最高的才念过四年书，有的不识字，甚至还有个别的人供菩萨。因为生产很紧张，我就在业余时间帮助工人搞文化活动：教语文、算术、教唱歌。总之，他们缺什么，我教什么。没有课本和教材，我只好凭脑子里的那点东西教。此外，还组织家属种菜养鸡。这对我是一个锻炼，摸出来一套熟悉他们的办法。这就是：必须和他们生活，战斗在一起，使他们感到你有用，愿意接近你，才能从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爱憎……

几个月后，回到哈尔滨。许多机关都需要人，这就没有时间写作了。我曾在妇委作宣传工作。后奉命去哈尔滨邮局工作。半年多来，从接收，到帮助他们建立工会。日本统治十几年，东北工人连什么叫工会都不知道，我做了过细的工作，通过群众，了解到大家所信赖的人，便选举出来当工会主席，我当秘书，逐渐地把工会干部培养起来。